

王建生 著

通往中兴之路

思想文化视域中的
宋南渡诗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中兴之路: 思想文化视域中的宋南渡诗坛 / 王建生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325-6056-1

I. ①通… II. ①王…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469号

通往中兴之路 ——思想文化视域中的宋南渡诗坛 王建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314,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6056-1

I·2416 定价:4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张 鸣

王建生博士的著作《通往中兴之路:思想文化视域中的宋南渡诗坛》即将出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建生来找我写序,我不能推辞。且将我读本书的心得以及我所知道的本书写作中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供读者参考。

元初方回《后进诗跋》曾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南渡犹有乾、淳。”(《桐江集》卷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诗坛兴盛繁荣,出现了“中兴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为代表的众多杰出诗人,上承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的诗歌传统,形成了宋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从宋室南渡,到乾、淳时期诗坛中兴局面的形成,经历了宋高宗绍兴时期三十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要深入认识南宋中兴诗坛创作兴盛的由来,不能不深入考察南渡初期数十年的诗学发展情况。解释诗坛中兴的原因,答案正蕴藏在南渡初到绍兴末年的艰难历程中。不过,在宋诗研究领域,南宋中兴诗坛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而绍兴时期诗坛受到的关注则相对少得多,虽然近年来也有钱建状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和白晓萍著《宋南渡初期诗人群体研究》等一些著作或博士论文问世,但仍然留下了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建生的这部著作,立意十分明确,就是以南宋初期诗坛为研究对象,以两宋之际的思想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重点,侧重从思想文化视域考察南渡时期诗歌的发展演变,通过动态地考察思想史及诗歌史的事件和现象,梳理出思想、文学发展的基本脉

络,并结合思想文化总体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理学走向繁荣的过程,全面考察诗坛走向中兴之前的发展历程,从而揭示促进诗坛中兴的诗学动力和思想史动机。这个思路,由于抓住了促进诗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就避免了停留于一般泛泛的现象考察。

建生读书非常勤奋,除了宋代诗歌文献,还读了大量的史书和思想史原典,而且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在我们商量博士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正是考虑建生阅读广泛、读书心细、思考深入的特点,我建议他采取将南宋诗歌发展置于思想史背景中去考察的思路。建生在这个大思路确定之后,又在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了南渡初到诗坛中兴这一时段的诗歌史考察。实际上,这一时段,历史的发展纷繁复杂。时局从动乱到偏安;文化从无暇顾及到重新整合、逐步振作;士人从流亡奔波到逐步安定;要从大量原始文献中把这一时期各方面的情况都梳理清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能够尝试挑战这个难题,体现了建生在学术上追求卓越的努力,而将政治文化史、士大夫精神发展史、思想史、文学史作整体观照的思考模式,更体现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追求原创研究的自觉。总之,本书所采取的从思想文化视域切入的研究角度,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局限,在拓展研究空间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

角度决定视野。由于采取了从思想文化视域切入,本书在考察南渡初期诗坛时,所看到的问题就和局限在文学史视域中不一样,往往能发现在一般文学史视域中不容易看到的现象。比如,作者考察了南渡初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政策,认为这是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初年的这一文化导向,确立了文学中兴的使命和发展方向。这一结论揭示了南宋思想文化发展的深层语境,深化了对南宋诗歌创作走向中兴的历史动机的认识。本书还重点考察了理学在南渡时期的发展进程及其对诗人的影

响,着重考察诗人对理学新文化的主动接受与发扬,讨论了理学思想通过哪些途径影响诗人,诗人接受理学后如何平衡诗、道关系等问题。在理学和文学的关系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牢牢抓住理学、文学中共有的话题,如“君子”、“活法”、“悟入”等,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把握内在关联;而理学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正是文人对心性修养的重视。明白了这一点,对南渡诗坛上的一些命题,如“余事及文章”、“胸中之活法”、“静观”、“孔颜乐处”、“不俗”,等等,都可以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给予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元祐典范人物的问题、“君子”理想及人格的问题,等等,也都导源于此。本文用了三章的篇幅阐发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在行文中,有些话题、材料看似陈旧,但角度是新的,因此见解也是新的。此外,本书还从思想学术的角度探讨了南渡诗坛和北宋文化传统的关系,作者认为,在诗坛走向中兴的道路上,南渡诗人上承元祐、下启中兴,他们远绍元祐之学,继承中原文化传统,重视理学修养,践履君子人格,拓展诗歌写作空间等等,都为诗坛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论述,不仅新颖,而且深刻,较好地揭示了从南渡初走向中兴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并为乾、淳诗坛繁盛局面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阐释。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视角的调整。

不仅如此,本书在对大量思想史、文学史文献作细致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呈现思想、文学之间的关系,着重描述思想史视域中的诗歌发展史,这对当下的诗歌史、思想史研究来讲都是一种的突破。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如果涉及到理学的背景,往往是以朱熹等人整理的理学史为准,而很少触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尤其很少理会两宋之际的理学发展一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却与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对照之下,过去一般的理学史研究,又很少去关注诗人这一精英群体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对理学新文化的发扬,而这应该是理学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这一学术空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学科划分而造成的三不管地带。王建生

正是注意到了这一学术空隙的存在,同时也是为了落实本书研究视角的需要,有意对两宋之际及南渡初理学的早期文化生态作了勾勒和还原,以期“重现”理学早期发展史。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些梳理、考辨,以及第二章第一节龟山墓志铭的相关问题的讨论,都出于这一动机。细心的读者当不会错过这些精彩的细节。

注重历史细节,是本书重要的特点。建生读书心细,善于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细心探寻,尤其重视历史细节的发掘考辨,探寻细节隐含的深层意义,把细节发掘考辨作为文学发展过程史研究的重要环节来处理,在研究方法上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通过细节的考证,本书澄清了在思想史、文学史的一些模糊认识,发掘了一些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和文学现象,还有许多新颖的观点散布在全书各章节中,比如,关于《龟山墓志铭》争辩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关于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的思想史意义;关于绍兴和议后朝堂与山林之士的思想分歧以及山林之士的人格践履,对“山林之士”的精神价值的发掘;咏物诗中人格精神的呈现;师法自然观念的诗学史意义;南渡诗歌创作中京洛追忆所体现的中兴想象等等,都发前人所未发。此外,作者还发现,吕本中《别后寄舍弟三十韵》的“莫以东南路,而无伊洛声”,与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记载北宋末伊洛之学“建安尤盛”的说法,刚好可以相互印证,从而为理学早期发展概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细节。这个例子,正是作者注重细节而得到的一个有趣发现。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不少。

当然,任何优点,有时往往会与缺点相伴。本书因采取了新颖的视角,对思想史和诗歌史的关系着眼较多,而对南渡时期诗歌创作本身成就的考察,则相对较为薄弱,而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成就的总结,关系到对中兴诗坛创作繁荣兴盛局面的诗学动因的揭示,还有待加以更加充分的论证。此外,作者善于捕捉历史细节,本书论述也以深细见长。但过于注重细节,有时会妨碍对宏观问题的把握。在空疏学风泛滥的当下,强调细节、强调史实考证,很有必

要,但优秀的研究,还是要注意掌握微观与宏观、材料与观点、细节与大局之间的平衡才好。这一点需要提出来与建生共勉。

王建生从200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上非常用心,读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而且特别注意探讨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平时的读书讨论中,逐步明确了还原场景、追索过程、考察细节、把握关键、探究原因的思路,希望利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探寻思想史和诗歌史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历史细节。为此,他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编写了一部翔实的“南渡思想、文学系年”,提供时间坐标、细节考辨、展示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再展开问题的讨论,进入本书正文的正式写作;有意尝试使用编年体的“系年”和按问题展开的正文互为呼应,有效地深化、延展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虽然本书出版时,“系年”部分未能正式收入,但还是可以看出,“系年”部分所做的工作,保证了本书正文部分的翔实可靠,“系年”对本书的成功,功不可没。希望建生继续把这部“思想、文学系年”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并扩展的整个南宋,完工之后,将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著作,值得期待,君其勉旃。

2011年11月24日

目 录

序	张 鸣 1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6
三、基本内容	8
第一章 南渡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学术文化重建	11
第一节 “最爱元祐”: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导向	12
一、宋高宗君臣对“元祐”政治资源的认同	12
二、推崇元祐学术的文化政策	19
第二节 文化统绪的承续	28
一、统绪的提出	28
二、理学统绪的承续	31
三、文学统绪的承续	36
第三节 对元祐典范人物的褒扬	41
第二章 南渡士人的“君子”理想与人格追求	57
第一节 南渡初年士人的“行义以达道”	58
第二节 绍兴和议后朝堂与山林之士的思想分歧	78
第三节 “山林之士”的人格践履	92
一、读书治学	101
二、砥砺品节	104

三、涵养心性	109
第三章 理学的发展及其对诗人的影响	117
第一节 南渡初理学的新态势	117
第二节 诗人对理学的接受与发扬:以吕本中、朱松为例	141
第三节 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诗学理论	161
一、“活法”	162
二、“悟入”	176
第四章 理学观念渗透下的诗歌写作	184
第一节 理学观念或立场的明确表达	184
第二节 “孔颜乐处”的追寻	194
第三节 咏物诗写作中格物理论的渗入	204
一、静观的体物方法	205
二、“意与物遇”	211
三、咏物诗中寄托的人格精神	216
第五章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共同指向	222
第一节 “不俗”之人与“不俗”之诗	226
一、“不俗”之人	226
二、“不俗”之诗	234
第二节 中正平和的诗学宗尚	239
第三节 师法自然	248
一、向自然界寻诗	249
二、从寻诗到献诗	254
三、理学家的自然观	258

第六章 南渡文人的中兴情结及其抒写	267
第一节 流亡奔波与亡国反思	267
一、流亡奔波	268
二、亡国反思	281
第二节 京洛追忆与中兴想象	295
一、京洛追忆	295
二、中兴想象	305
 结语 开启中兴诗坛的大门	322
一、从南渡诗人到中兴诗人的代际传承	322
二、从南渡诗坛到中兴诗坛的不变与变	341
 附录一：《龟山墓志铭》考辨	362
附录二：《与高抑崇书》作者考辨	373
参考文献	379
后记	391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大家为核心的中兴诗坛,成为继元祐诗坛之后宋诗发展的又一高峰。高峰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关注中兴诗坛的学者已有一些讨论^①,但什么力量促使诗坛走向中兴,即哪些因素是诗坛中兴的原动力,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探究。诗坛从低谷到高峰^②,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然而,对诗坛走向中兴的复杂过程,至今还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这无疑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推进,如无法动态地把握从北宋到南宋的诗歌发展变化,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兴诗坛的创获与成就,当然也无法明晰诗歌史的发展与思想史的进程间的内在关联,等等。

什么是诗坛中兴的原动力?诗坛走向中兴的过程如何?这是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从宋诗史的连续性来看,离中兴诗坛距离最近者,当然是宋高宗朝的南渡诗坛了。学术界认为它没多大成就,故相关的系统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在宋室南渡的大变局下,南渡诗坛及时更新,从内容题材、诗法技艺、诗人心性修养等各个

① 如曾维刚认为中兴诗坛的重要来由便是师友渊源与诗学传承(《南宋中兴诗坛的建构》,武汉大学文学院2006届博士论文),属于对诗坛中兴缘由较早的探究,但还停留在描述传承脉络的层面,缺乏深度的挖掘。

② 吴小如先生将从元祐到乾道、淳熙的诗歌,形象地称为“马鞍形”(《宋诗漫谈》,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期),而北宋徽宗朝至高宗朝的诗歌恰好处于马鞍的底部。

方面,都为诗坛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南渡诗人积极探寻新的诗学理念、方法,拓展写作空间,推陈出新,这已部分地展现了诗坛中兴的动力。诗歌史发展的实际提示我们,欲揭示诗坛走向中兴的过程、探寻诗坛中兴的动力,应将南渡诗坛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以上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中兴过程的揭示,必然涉及对诗坛发展的趋向、动力的探讨;对诗坛动力的探寻,也会深化我们对诗坛中兴历程的认识。

诗坛中兴的背后其实是文化中兴。乾道、淳熙时期,文化中兴有多种呈现方式,但理学的繁荣与文学的兴盛^①,无疑是文化中兴局面得以成立的两大支柱。那么,诗坛中兴与理学兴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兴诗人中,以诗人入学派,已不算新奇。诗人与理学家的亲密交往,对理学修养方式的体认,对理学精髓的吸收,等等,更是寻常可见。处于上升期的理学,获得文人的广泛认同,成为社会性的思潮,进而成为一种追求道德修养的文化,这种文化取代了过去的文学文化^②。理学作为一种新文化,已经深入到文人的精神世界,并渗透在诗歌写作中。这惊人的变化,既为诗人培植了道德根基与学养,又为诗歌带来了新意:那富有生意的自然万物,那从容优游的心境,那平淡中见心性工夫的诗艺。两宋之际(1102-1162)文学与理学的复杂关系,构成流动的立体交叉的思

① 宋代“道学”之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孔子开创的儒家传统;狭义上则指继承孔孟道统的以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专指程朱系统,并不包括心学及其他学派的儒家学者。“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指义理之学,与辞章训诂相对。至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包括程朱道学,也包括了陆九渊等人的心学,这个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广义上的概念。因二程与朱熹皆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后来又习惯于用“理学”指称程朱一派的思想体系,与陆王心学相对,这是狭义上的概念。本文取广义上“理学”概念,配合狭义上“道学”概念,视上下文的需要而交互使用。

② 包弼德从唐宋文化转型的宏观视角给予了解释:“道学运动要求士人按正确的方法治学,并为他们提供一种追求自我修养的环境。事实上,它创造了一种让人们参与的新的士人文化。……道学以一种伦理实践或道德修养的文化,取代了过去的文学文化。”(《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38)

想文化景观。诗人与理学间复杂关系的事实,为笔者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诗坛中兴的动力提供了依据,并启发我着重从诗歌与理学关系史层面展开相关讨论。而且,理学家并不完全排斥诗歌写作,相反,一些理学家的诗,颇堪讽咏,成为南渡诗坛和中兴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对理学家及其诗歌的关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本书尝试从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南渡后思想文化的态势和诗歌的发展趋向,探究重要的诗歌史事件、现象背后的思想史动机,并对其中隐含的思想史和诗歌史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南渡诗坛的进程与官方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两宋之际,受官方文化政策的影响,诗文的命运一波三折:崇宁党禁,元祐学术被禁,诗文深受其害,诗歌反映现实的一面极度收缩,文章之士多沉沦下僚;靖康之后,党禁解除,诗文重获生机,南渡初年反映现实的作品迅速增加,且涌现出表达流亡奔波、家国哀痛、中原记忆、中兴情结等主题的诗歌;绍兴和议之后,秦桧专权,实施文禁,告讦之风甚厉,有识之士践履“君子”人格,涵养心性、砥砺品格,并通过诗歌陶写心性。两宋之际的官方文化政策,紧→松→紧,经历了一个大回环。官方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的命运息息相关,活动于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于文禁相当敏感,在北宋徽宗朝时,他们已经积累丰富的应对文禁的经验,所以到了绍兴时期秦桧大兴文字狱时,他们一般都能坦然面对。而且,他们大都是儒学的忠实信徒,始终是尊君的、重义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朝廷开始有限度地革除弊政,如言路闭塞、告讦成风、罗织文祸等,局势在缓缓地中兴方向推进,文人的写作空间渐渐的扩大,文章对现实的关注也在增强,南宋诗歌发展的黄金时间即将到来。经历大回环之后,诗文创作文主体积聚了宝贵的经验,体悟到吟诗作文的诀窍,而这些又成为文学中兴的生长点。因此,应当将两宋之际的官方文化政策,看作一个动态的、连贯的系列,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中,不乏从文化政策角度立论的

论著,但大多数研究者仅把文化政策作为文学发生的背景资料。本书则试图通过全面了解文学外部的生态环境,剖析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文人对文化政策的回应,进而把握文学与文化政策间的互动关系。

理学的发展同样与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此外,相关政治文化事件也会影响到理学的进展,比如绍兴六年(1136)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绍兴八年(1138)绍兴和议,对理学的进程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揭示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探寻影响思想史发展的深层原因,既是对诗坛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的深究,也是对政治文化史、思想史、诗歌史复杂纠葛的梳理。

南渡后,无论是诗歌,还是理学,在时代主题、文化政策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做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进而影响到二者的关系。政治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诗歌、理学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三者形成强大的张力。所以,本书从构思到写作,始终把握三个维度的动态关系。就南渡诗坛而言,对苏轼、黄庭坚等北宋诗学资源的整合,成为南渡诗人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凡对诗法有所扬弃的,大都兼学苏、黄或以苏济黄。就思想资源来讲,道学追求自我修养的境界,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潮流,道德与学养成为普范性的判断标准。出于诗人与学派之间,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的典型特征,诗人接受并发扬道学,在提升个人道学修养的同时,也是在为诗歌培植根基。而就时代主题而言,自建炎南渡后,南宋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奠定了南宋的学术文化格局;绍兴八年之后,朝廷确立对金和议的基本国策,则奠定了南宋偏安的政治格局,恢复中原的梦想破灭,文人不自觉地将中兴的主题转移到复兴中原文化的努力上。以上所说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会随时代主题、文化政策的变化而牵转,而文学与思想之间又不间断地进行碰撞与对话,从而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文化景观。笔者在构思、写作中,尽力突出诗坛走向中兴的脉络,让三个维度

在牵转中流动起来,希望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部流动的立体交叉的文学史。

下面对研究对象做一些界定:本书所论的“南渡”,起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所论的“南渡诗坛”,指宋高宗朝诗坛的总体状况,包括思想文化语境、创作主体的思想取向、诗歌写作、诗学观念,等等。笔者在准备、写作时,视野并未局限在南宋高宗一朝,而是跨越两宋四朝(北宋徽宗、钦宗朝,南宋高宗、孝宗朝),即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共88年。之所以向前回溯,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始,元祐之学被禁,苏、黄文学,程氏道学均在被禁之列。南渡后,朝廷确立了“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元祐学术得以复苏,成为南渡学术文化重建的基础。欲详悉南宋初朝廷对元祐学术之新政,不得不重温北宋徽宗朝之旧策。另一方面,南渡文人都有北宋生活的阅历,又有“南渡”的新阅历,诗歌创作保持旧风格的同时又有新变;创作主体的思想具有延续性,他们在北宋应对困境、危机的策略,以及对新思想(如二程洛学)的接受,会顺延至南宋,欲对创作主体做全面的观照,不得不考察其在北宋时期的阅历、思想及创作。之所以向后延展近三十年,主要想考察有哪些现象、特质是南渡诗坛和中兴诗坛所共有,借此明晰南渡诗坛中兴的历程及原因。对诗坛中兴历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评述南渡诗坛在诗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意义。此外,还要对“中兴”略作说明。在宋人那里,“中兴”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接续宋朝政统的高宗即位,二是恢复中原、光复祖宗之业的政治中兴,三是政治稳定、文化繁盛的中兴局面。正因为如此,“中兴诗坛”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到底是“中兴”时期的诗坛呢,还是诗坛本身的“中兴”呢?本书所论的“中兴诗坛”,指的是乾、淳时期诗坛中兴的局面。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对诗坛中兴动力的探寻,以及诗坛走向中兴的过程揭示,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在“问题的提出”一节,笔者已交代了研究的视角,即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讨论诗坛走向中兴过程中的动力问题。从南渡诗坛到中兴诗坛的历程,其实是过程史学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所说的过程史,指的是由一个个关键的“点”衔接而成的历史线路;梳理这一线路的任务,一方面是还原历史,另一方面揭示出关键“点”所隐含的微妙的、深层次的历史动机。因此,对过程史的研究,既要把握重要的时间节点,又要探寻重要的历史细节。

在对高宗朝思想文化进行整体把握时,笔者选取了三个时间节点:绍兴六年(1136)、绍兴八年(1138)、绍兴二十五年(1155)。绍兴六年在思想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道学中人如朱震、胡安国等试图说服朝廷定道术于一尊,陈公辅却上疏请禁伊川学,道学在向官方迈进的道路上受阻。刘子健先生以为,“儒家诸派就意识形态的正统及其传承线路问题进行激烈辩争”^①,故认为本年意义重大。笔者认为,绍兴六年也是南宋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即“国是”由“未定”转向“定”的关键年份,也是旧问题中夹杂着新问题的一年。在这一年,南宋朝野上下情绪高涨,杨沂中藕塘大捷后,伪齐一蹶不振,对南宋朝廷威胁最大的伪齐政权很快被金人废掉,南宋内外局面初步安定。此时,元祐学术、王安石新学、元祐党人等后党争问题仍然是热点;而伪齐被废之后,南宋直接面对的便是大金了,恢复中原还是偏安一隅,又成为南宋王朝的新问题。绍兴六年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在思想史领域,所以,笔者选取本年份作为南宋初年的一个节点。选取绍兴八年作为时间节点,比较容易理解。绍兴八年是分水岭,此前为“国是”未定之时,此后对

^①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6。

金和议成为基本国策。和议之争,朝廷的内外政策都有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说绍兴八年是转关之年,北宋末年延续的新学与元祐之学的对阵,转变为主战与主和的交锋。绍兴和议,对诗坛、理学,都有重大的影响。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基本国策并未发生改变,但秦桧专权时期的一些弊政及时得到革除,那些被流落在政治边缘的士大夫被召回朝廷,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老一辈诗人或道学家,基本上已进入暮年,如王庭珪、曾几、张元幹、张九成、胡铨、胡宏等;新一代诗人或道学家已经进入政治文化生活中。中原耆旧与乾、淳文化中兴的主力,在绍兴二十五年前后共聚朝堂内外;这些中原耆旧将以师友渊源为纽带的学术文化传承的重任,成功地交给下一代人。以上三个时间节点,是构思、立意的支撑点,但在文章结构中并不一一呈现。在论文的整体架构中,还是以问题来统摄全篇,而将时间节点上重要的史实作为寻找问题根源的突破口。

重视历史细节,是笔者着重强调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历史研究中,细节往往容易被忽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价值,这就需要研究者要有方法论的自觉,既要敏锐地发现,又要善于辨别、运用。在对南渡诗坛走向中兴的过程的考察中,选取那些有可能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不论是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还是诗歌史的,发掘这些细节所隐藏的思想文化讯息,揭示其意义,就有可能使这些生动的细节成为过程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历史细节的探寻,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研究者观照历史时的另一着眼点。在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一些细节,发掘其中隐含的深层意义,有助于我们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一些常见的材料也可能焕发“新”意,如《龟山墓志铭辨》中关于陶渊明的评价(第二章第一节)、胡寅责高阅书中所反映的道学之士的思想分歧(第二章第二节)、对浯溪中兴颂的题咏中所隐含的中兴情结(第六章第二节),等等,都属于“小题大作”。本文并不以考辨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为目的,停留在细节考辨的